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

邱立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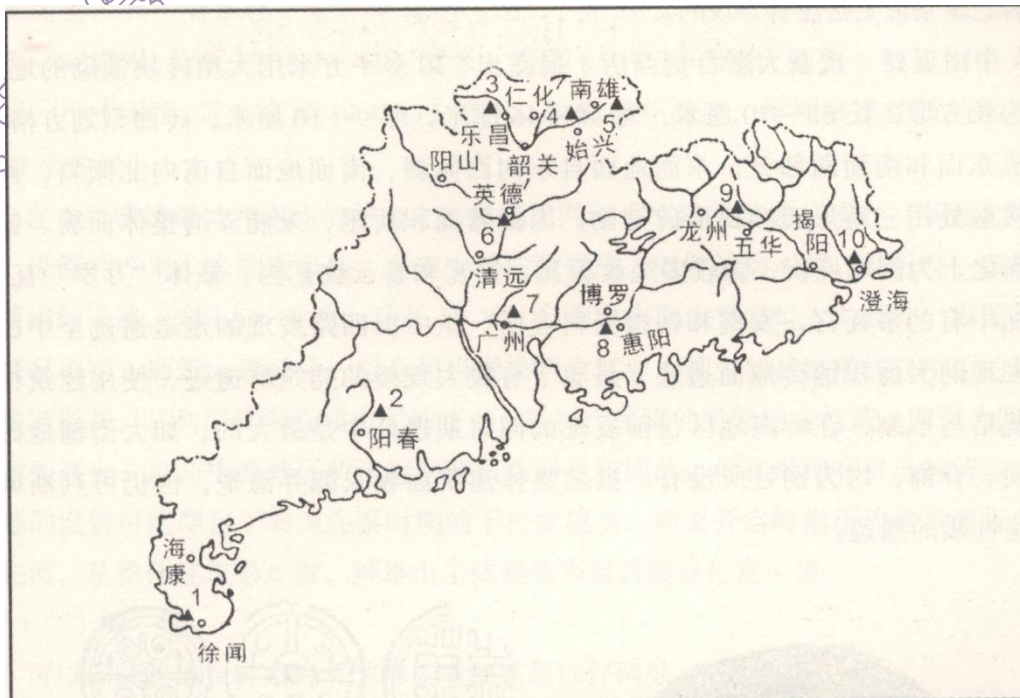
秦统一后，岭南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考古学文化看，秦汉时期较之先秦时期有相当大的进步，尤其是秦汉时期建筑遗址的发现，其崭新的面貌，是先秦遗址中不曾有的。本文将广东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作一概述和初步探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20世纪40年代，外籍学者麦兆汉在澄海发现了汉代绳纹瓦遗存^[1]，可惜其后未能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甚至一度被遗忘。60年代初，广东省文管会文物工作队在始兴县白石坪发现了绳纹瓦遗存^[2]，当时划属战国时期。其后在英德连江口发现了以绳纹瓦为特征的文化遗存^[3]，判断为汉代遗址，这是广东地区首次正式报道的汉代建筑遗址，可惜未经发掘，建筑形制并不清楚。70年代中期，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广州市文化局基建时，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4]，推断为秦汉时期造船工场遗址，其上有南越国时期的宫室走道遗迹。80年代以来，全省各地相继发现了更多秦汉时期的建筑遗址：1982年五华县文物普查队发现了五华狮雄山遗址^[5]；1983年澄海县文物普查队重新发现了澄海龟山遗址^[6]；徐闻县文物普查队发现了徐闻二桥、仕尾遗址^[7]；1984年始兴县文物普查队发现始兴罗围城址^[8]；南雄县文物普查队发现了南雄甘埠山遗址^[9]；1985年乐昌县文物普查队发现乐昌洲仔城址^[10]；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与惠阳县博物馆发现惠阳蚬壳角遗址^[11]；1988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与阳春县博物馆进行三茂铁路工程考古调查时发现阳春古旧漪遗址^[12]；广州市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基建时也发现了汉代建筑基址^[13]。此外，广州光孝寺内也曾两次发现含汉代绳纹瓦的文化遗存。

上述遗存中，五华、澄海、乐昌、阳春、徐闻及广州6处地点经考古发掘，对其内涵有一定程度的认识。除阳春未找到建筑基址外，五华、澄海、乐昌、徐闻、广州市发现了建筑基址。广州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的建筑基址同属一处建筑群。始兴罗围经调查勘探，应属一处城堡遗址。惠阳、南雄、英德等地未经发掘，建筑基址未能确定。广州光孝寺经发掘出土一些汉代绳纹瓦^[14]，未找到汉代建筑基址。

这些建筑基址或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大大丰富了对岭南这一时期房屋的建筑形式及同期文化的认识（图一）。



图一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

1. 徐闻五里二桥、仕尾
2. 阳春春湾古旧塘
3. 乐昌河南洲仔
4. 如兴罗围犁头嘴
5. 南雄乌迳甘埠山
6. 英德连江口江口嘴
7. 广州中山四路、五路，光孝寺
8. 惠阳潼湖蚬壳角
9. 五华华城狮雄山
10. 澄海上华龟山

二

已发现的广东地区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大体可分为宫室、城堡、官署等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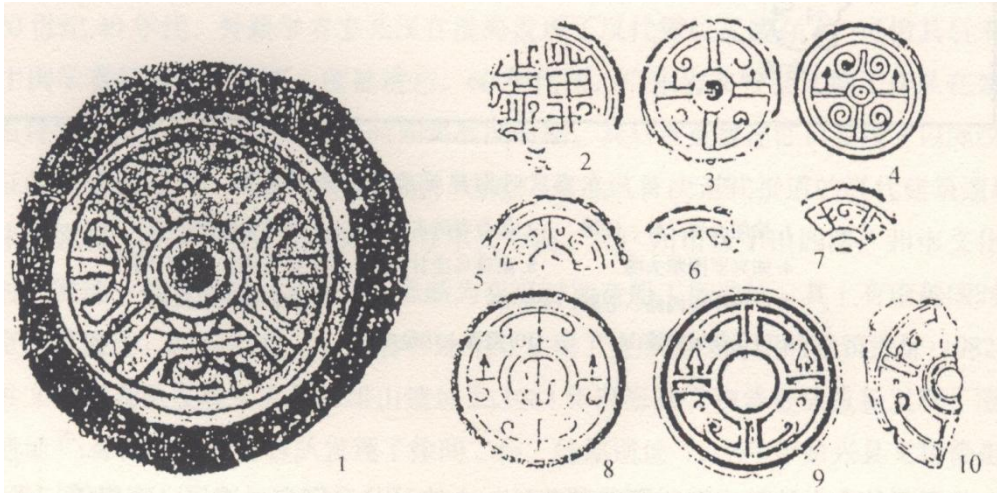
(一) 宫 室

属于这类遗址的，有广州中山路与五华狮雄山两处。

广州中山四路与中山五路在距地表 5-6 米处分别发现用砖石铺砌的走道和用方砖铺砌的地面。走道与地面相距 100 多米。从地理形势及出土遗物判断，属同一时期的建筑群。中山四路的砖石走道长 20 余米，呈东北向西南延伸（即向中山五路延伸），走道中间平铺两行灰白色砂岩石板，两侧为大型印纹方砖，砖边长 70 厘米，厚 12-15 厘米，表面饰重菱形纹图案（图三，1）。走道面上及附近文化堆积中多见绳纹板瓦、筒瓦，有些瓦上印有“公”“官”“卢”等单字戳印。还发现有卷云箭镞纹瓦当，涂朱的“万岁”瓦当（图二，2-7），砖质窗棂，涂朱或涂绿的砖脊饰等建筑构件。筒瓦直径 13-15 厘米，瓦当直径 13.6-15.2 厘米。距走道 10 米左右的绳纹瓦砾层下发现大型木构建筑，发掘简报推断为造船工场。也有的专家认为属建筑遗存^[15]。走道遗迹属官署建筑基址则是没有异议的。

中山五路（现新大新百货商店）揭露出 130 多平方米用大型砖块铺砌的地面，砖为长方形，长 65-70 厘米，宽 40-46 厘米，厚 9-10 厘米，砖面刻划方格纹。分成东面和南面两部分，东面地面自东向西倾斜，南面地面自南向北倾斜，两部分接触处用三角形砖和梯

形砖铺砌。因揭露面积所限，未能弄清整体面貌。铺砖地面之上为倒塌堆积，含较多绳纹板瓦、筒瓦和卷云纹瓦当、篆体“万岁”瓦当，筒瓦中有的带瓦钉。发掘和钻探资料表明，从中山四路发现的走道遗迹至中山五路发现的大面积铺砖地面遗迹，是属于有较大规模的建筑群遗迹，使用建筑构件的规格与形制，在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同时期遗址中是最大的，如大型铺地砖和窗棂、脊饰，均为别处所没有。虽然整体建筑面貌未能弄清楚，但仍可判断属于宫室性质的遗迹。



图二 瓦当

1. 徐闻仕尾 2-7. 广州中山四路 8-10. 五华狮雄山

五华建筑遗址位于华城镇狮雄山上，在山的顶部东北面平台上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坐北朝南，方向 173° 。基址西部因早年平整土地而被毁无存，现存基址东面的一部分，揭露出东部回廊和南北回廊的少部分。东回廊通长33米，内宽2米，廊道东边有土筑墙基，是利用原生土层两面低挖而成。墙基上有柱子洞遗迹，墙体已不存，结构不明。东回廊与南回廊相接的东南角是一处角楼台基，高出回廊地面1.6米，与东回廊的墙基相连。角楼南北长约7米，东西最宽3.9米，台基上亦有柱子洞遗迹。南回廊残长5.8米，残宽3.2米；北回廊残长11米，残宽3.4米。三面回廊环绕的是一处高台，各回廊有台阶遗迹通向高台。高台亦利用原生土层作台基，其上为主体建筑，可惜早已被毁去不存。基址内堆积大量绳纹瓦和一些卷云箭链纹瓦当，其中有篆体“定”字瓦当（图二，8-10）。板瓦长47.5-54.5厘米，宽34.5-40厘米；筒瓦长38.7-41.5厘米，直径15-15.6厘米；另见一种形制更大的筒瓦，尺寸不明；瓦当直径14.4-15厘米。根据残存遗迹，推测整座建筑的面积约1400平方米。

在大型建筑基址西南面的平台上还发掘了两座小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座面宽约11米，进深约5米，未发现墙基，发现少量柱洞遗迹，墙体结构不明。附近有一条用砾石铺砌的道路，宽1.5-52米，残长23米，自西向东面大型基址方向延伸。发掘与勘探情况表明，狮雄山遗址是一组有相当规模的建筑群，其大型基址是仿自中原的高台榭建筑形式，又利

用岭南低矮山冈的特点，进行小范围的平整然后构筑。四面为回廊，中间为高台，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建筑布局是相同的。但在局部有自己的特点，如角楼的设置可能源自于岭南先秦时期的干栏式建筑，而又开启岭南历代建筑盛行角楼之先河。从整体建筑形式看，狮雄山主体建筑当属宫殿或行宫一类。

（二）城堡

可以确定的地点有始兴罗围犁头嘴和乐昌洲仔两处。

罗围犁头嘴城堡遗址位于始兴县城西北7公里浈江与墨江交汇处。城址平面呈近三角形，西傍墨江，东北临浈江，东南依山地。城墙周长约420米，城内东西长120米、南北宽70米，总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东北面和西面城墙高3-4米，南面城墙高4米。墙体呈梯形，上宽约2米，下宽约4米，用河卵石垒筑墙基，用土版筑墙体。城内南高北低，南面一块平台高出北面2.5米，长60多米，宽约12米。东面有一个宽约6米的豁口，可能是一处城门通道遗迹。在城内堆积中发现大量绳纹瓦、抹光绳纹瓦和素面瓦，与始兴县城郊白石坪所见的绳纹瓦相同。据始兴县博物馆廖晋雄调查，白石坪的绳纹瓦与含米字纹、重方格交叉纹陶片的堆积分属两处文化遗存，后者年代为战国时期，前者则与罗围城址同属汉代。

洲仔城址位于乐昌县城郊西南1.5公里，在北江上游武江的南岸。遗址大部分已被河水冲毁，仅残存小部分。揭露出一段用河卵石砌筑的墙基，残高0.3-0.4米，宽2米，东西向长3米。从残存遗迹分析，这段城墙至少长50米以上。已揭露的墙基西南角向北转折，推知这是该墙体西南转角的地方，从而得知城址的主要位置在墙基的东北面。据乐昌县博物馆1986年调查，北面已有20多米长向江心延伸的地带被洪水冲毁，现已成河滩。由此推测，此处城址的主体部分位于现武江河之中。古代武江河道（洲仔段）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宽，也可能是河道已往南移。因城址位于洲仔突出部，原来河道较为曲折，现在城址已大部毁去，河道亦较前畅直。在墙基内侧，有大量绳纹瓦片，瓦内壁均为乳点，瓦多破碎，尺寸不详，仅知筒瓦直径为16厘米。在河滩还采集到形制较大的柱础石。这些遗物，均系城址内的建筑构件。

（三）官署或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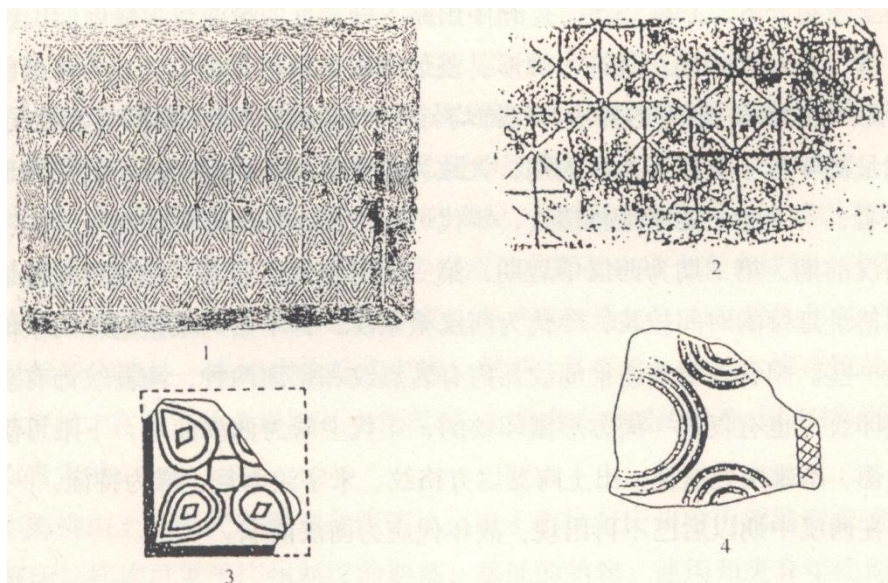
包括澄海、惠阳、徐闻、阳春、英德、南雄6个地点。

澄海龟山遗址位于韩江支流东溪河西岸。遗址分布在龟山的东、西、南面山坡，据调查分布范围达2万平方米。因当地炸石取土破坏严重，现仅存南坡部分4000多平方米。经发掘勘探，南坡有三个平台营造建筑，其中以第三级平台面积最大。发掘资料表明，龟山遗址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未发现基址，出土瓦当为卷云箭镞纹，尺寸较大，瓦类内壁为乳点纹，器表饰粗绳纹；第二期发现有长方形基址和凹字形三合庭院式基址，后者规模较大，有殿堂、配房、廊房。瓦当主要为卷云乳钉纹，尺寸略小，瓦类内壁出现素面或布纹，

器表绳纹略规整，出现有铺地方砖；第三期发现有垒石墙基的圆形基址和垒石墙体的房址，并有垒石墙基的院墙，瓦当、瓦类形制与第二期大致相同，还有用长方形砖砌筑房址的转角墙基，反映出新时期房屋构造形态上的变化。遗址出土大量陶器、铁器、铜器，还有石器、玛瑙珠饰、瓷钺等。龟山遗址整个建筑群的规模与整体面貌虽然还不很清楚，但从遗址分布及发掘情况分析，建筑群具有相当规模，属于级别较高的府第官衙建筑群。

惠阳县潼湖蚬壳角遗址位于东江南岸的一块台地上，文化堆积厚0.5米，含绳纹瓦及戳印方格纹陶片，未进行发掘，建筑基址情况不明。

徐闻遗址位于五里乡濒临海边的二桥村和仕尾村。绳纹瓦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在二桥村西部有一处绳纹瓦堆积密集的地方，地势较高，其范围长约80米，宽约40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经发掘，找到部分建筑遗迹。1993年村民谢玉挖屋基时，发现一枚铜方印[16]，上有龟钮，印面刻篆体“臣固私印”四字，字体草率而不规整，印长2.5厘米，宽2厘米，通高1.3厘米。仕尾村北侧有较多绳纹瓦堆积，发现“万岁”瓦当(图二，1)和卷云纹瓦当以及饰有米字纹、菱形纹或大格纹的铺地砖(图三，2)，砖长度不明，厚2.8-3.5厘米。筒瓦直径13-17厘米，瓦当直径14.5厘米。说明有较重要的建筑基址在这里。



图三 铺地砖

1. 广州中山四路 2. 徐闻二桥 3、4. 阳春古旧塘

阳春古旧塘遗址位于春湾镇东北2公里处的古旧塘村北面南蛇湖山，在漠阳江东岸，山高40余米。经调查发掘，出土较多绳纹瓦和零星的铺地方砖，铺地方砖有两种纹饰，一种为阳纹，边缘凸起一周宽带，中央纹样略近方形，四角分别有一个用二至三周线条组成的叶形纹，叶形内各有一个菱形纹(图三，3)；另一种为阴纹，边缘刻划菱格纹，中央阴刻两圆圈，四角已残缺，似阴刻叶形纹(图三，4)，砖边长21.2厘米，厚2-2.2厘米。

出土物还有戳印方格纹陶瓮、罐、钵、铁锄等。未发现基址，据调查，堆积主要位于南坡及山顶处，基址可能亦在那里。

英德连江口遗址位于连江与北江交汇处的江口嘴，在山冈南坡发现有含绳纹瓦的文化堆积，共存有饰米字纹、方格纹陶罐、瓮碎片。因未发掘，建筑基址亦未发现。

南雄乌迳甘埠山遗址，据调查绳纹瓦分布面积为 2400 平方米。板瓦长度不明，宽 30 厘米，估计也是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群。惜未进行发掘，详情不明。

此外，广州光孝寺出土一些绳纹瓦，虽然未发现同期的建筑基址，但至少说明，应有建筑基址在此一带。

三

上述 11 处建筑遗存，其中粤东 3 处（惠阳、澄海、五华）；粤北 4 处（乐昌、南雄、始兴、英德）；粤中 2 处（广州中山路、光孝寺）；粤西 2 处（阳春、徐闻），均位于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的地方。各处遗址文化面貌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如堆积中均含有绳纹瓦，其中广州、乐昌、五华、惠阳几处瓦的内壁均为乳点纹；澄海、始兴、徐闻、阳春等地瓦的内壁既有乳点纹，也有布纹和素面。广州中山路、五华、澄海、徐闻各处均出有瓦当，基本特征为卷云箭镞纹和卷云乳钉纹，瓦当上的文字均为篆体。遗址中的陶器，以瓮、罐、盆、碗为基本组合，纹饰以戳印方格纹为最大特色。这些都反映各处遗址处于同一个大时代，遗物的基本形制、制作风格都是基本相同的。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尚未有制作瓦的记录，秦统一岭南后，才从岭北传入制作瓦的技术。

从出土遗物分析，五华、乐昌、广州中山路三处遗址的情况最为接近，出土陶器瓮、罐、瓶、盆、釜形制相同，纹饰以圆形、菱形或组合戳印为特色，还有水波纹、米字纹、篦点纹、划弦纹等，所有的器形与纹饰均与广州西汉前期墓^[17]的同类器相同。因此，这三处遗址的年代不会晚于西汉前期，大致为秦至南越国期间。惠阳蚬壳角遗址，从瓦的形态看，与上述三处遗址较接近，年代可定为西汉。澄海龟山遗址分为三期，第一期 of 西汉前期，第二期 of 西汉中后期，第三期 of 东汉。始兴、徐闻两处遗址，瓦类情况表明遗址延续的时间较长，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其中始兴城堡遗址的素面瓦年代可能更晚一些。阳春古旧塘遗址绳纹瓦内有乳点纹和素面两种，陶器纹饰有多周圆形或菱形戳印纹，也有仅饰一周方形戳印纹的，年代上限为西汉前期，下限可能至东汉时期。英德、南雄两处遗址，出土陶器以方格纹、米字纹陶瓮、罐为特征，一般来说，米字纹陶在西汉中期以后已不再出现，故年代应为西汉前期。

四

秦汉时期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上述建筑出现的历史背景，这一方面是秦统一岭南后从岭北输入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制瓦技

术，另一方面则与秦末汉初建立的南越王国有直接的或密切的关系。

广州中山四、五路的建筑基址，年代为南越国时期，其遗迹已经知道有大型走道和面积较大的铺砖地面。砖与瓦的形制都较大，铺地方砖的尺寸较之福建崇安汉城遗址^[18]的同类器要大，瓦类则较接近。大型方砖铺砌地面多见于大型建筑的走道或天井四周，尤以宫室最为常见，如秦咸阳宫^[19]、西汉长安明堂遗址^[20]，均可见大型方砖铺砌走道。秦末汉初，赵佗在岭南立南越国，建都于番禺（今广州）。据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考证，当时番禺城“周十里”是可信的，其范围东在今登峰路、长塘街，西在今纪念堂以南教育路一线，南临珠江（当时为海湾，即今西湖路一带），北在今越华路附近。^[21]推测城址东西直线不足2公里，南北直线为1公里左右^[22]。据此，中山四路大型走道遗迹很可能就是赵佗宫殿基址的一部分，其西面中山五路的建筑遗迹亦应是宫殿周围的附属建筑。

遗址的大型走道不远处有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发掘简报认为属造船工场遗迹。据发掘简报介绍，走道是被含汉瓦最多的第8层所叠压，在“造船木料加工场地”亦出有绳纹瓦，在此处出土的陶片和“造船台”出土的陶片，器形、胎质、纹饰都与第8层所出者相同，可见“造船工场遗址”的年代与第8层遗物的年代非常接近。秦统一岭南的时间是公元前21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在公元前204年，其间相距仅10年，倘若说，秦军南下即在番禺建造如此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在短时间里废弃而又在其上兴建宫室，似乎是不可能的，与这处木构建筑相类似的遗存在先秦时期的高要县茅岗遗址亦有发现^[23]，很可能是岭南土著民族所流行的“干栏式”建筑，或许是当时居住在番禺的土著人首领的居室，秦军占领番禺后废弃，其后南越国在此兴建宫室。因此，在遗址堆积的最下层有土著文化特色的几何印纹陶片，如米字纹、水波纹、席纹及重方格交叉纹，这些纹饰的陶器在广东十分常见，如增城西瓜岭、始兴白石坪遗址^[24]、封开利羊墩^[25]、揭阳中夏^[26]墓群等地。广州西汉前期墓也出土有水波纹、米字纹陶器，但重方格交叉纹陶器基本不见。也有专家认为“造船遗址”本身就是南越王朝的汉台遗址或南越王宫遗址，木构建筑是其中的一部分。^[27]看来，有关木构建筑的性质还需作深入的探讨。在其上的含绳纹瓦文化遗存，走道遗迹及铺砖遗迹，属南越国官室遗址，则是可以肯定的。

五华狮雄山上的汉代宫殿式建筑遗址，出土遗物与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同类器相近，戳印纹样均可见于广州西汉前期墓，基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均应在南越国时期，说明与南越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根据其地理位置及有关文献史料的记载，应为南越王赵佗所筑“长乐台”遗址。五华县于秦汉时为龙川辖地，秦时赵佗为龙川令。东晋时在此置长乐镇，北宋设长乐县，均以长乐台而得名。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佗之旧治。”不仅认为“长乐台”在此，还认为“龙川县治”亦在此。并将长乐台与广州越王台、朝汉台及新兴白鹿台并称四台。清梁廷枏《南越五主传》载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曰长乐”。上面两说对

长乐台的兴建原因的解释并不一致，但在“五华山下筑长乐台”这一点是相同的。因此，狮雄山汉代建筑即为南越国赵佗的“长乐行宫”当无疑义。其废弃年代即在南越国灭亡之际。

乐昌洲仔遗址是一处城堡遗址，遗物的最晚年代为西汉前期，不会迟于南越国时期。洲仔遗址临河高居，所处之地又有泷口之称。《水经注》载：“泷口有任将军城，南海都尉任嚣所筑，嚣死，尉佗自龙川始居之。”《元和郡县图志》载：“秦楚之际，南海都尉任嚣因中国方乱，欲据岭南，故筑此城以图进取，嚣死，此城尉佗因之，遂有南越。”《寰宇通志》也有关于任嚣在乐昌西南二里的武水筑城，派兵戍守，俗称“任嚣城”的记载。可知洲仔城堡始建于秦，后继于南越国，故有“任嚣城”和“赵佗城”之称谓。此处城堡大概在南越国灭亡后即废弃不用，所以在城址没有发现西汉中期以后的遗物。但从城址南面一两公里处的对面山上近年发现春秋战国及两汉时期墓葬群^[28]，说明这里自周代以来就是南岭的交通要道，经济发展，人口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至东汉时期，粤北的韶关才繁荣起来，故韶关西河一带，多见东汉墓而少见西汉墓^[29]。

还应提出来讨论的是，《乐昌县志》认为任嚣城筑于武水北岸，后赵佗筑城于南岸，使两城夹武水而互为犄角之势。这与《水经注》等记载的情况不同。调查表明，洲仔城址对岸一带迄今未发现有关的遗迹（包括遗址和墓葬），因此，《乐昌县志》一说还缺乏证据。洲仔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可证明《水经注》所载是言之有据。

与南越国史迹直接有关的可能还有英德连江口遗址和阳春古旧塘遗址。连江口遗址位于北江与连江交汇处，北江古称浈水，连江古称涯水。《水经注》、《英德县志》、《英德续县志》均载这里秦时设浈浦关，后赵佗绝道自守，“筑万人城于浈水”，连江口遗址与此记载大致相符。虽然基址情况不明，但据遗物地点尚可确定。

阳春古旧塘遗址北面相距不远即为新兴，《南越五主传》及《广东新语》都有新兴（汉临允）筑白鹿台之记载，言及赵佗“于临允县（今新兴）南获白鹿，故即其地筑白鹿台”。春湾，隋时为铜陵县地，《旧唐书·地理志》谓铜陵县，本汉临允县，属合浦郡，可知春湾汉时为临允辖地，北邻即为今新兴县，阳春新兴两地迄今仅在春湾古旧塘发现汉代建筑遗址，且年代可早至南越国时期，推测古旧塘遗址当与“白鹿台”遗址有关。鉴于遗址年代为西汉至东汉时期，故与西汉时所置临允县治所也可能有一定关系。由于基址尚未找到，遗址的建筑形制还不清楚，需要做进一步发掘才能予以证实。

广州光孝寺内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存，与南越国史迹亦应有一定的关系。一是相传任嚣死后葬于此处；二是据说南越第三代王赵建德的故宅建在此地^[30]。前者目前还未有线索，后者则与发现的建筑遗物或许有某种关系。位于中山五路北侧的人民公园内，亦曾出土汉代“万岁”瓦当，应是宫庭或府第之所的遗迹^[31]。1990年一位旅游者在越秀山公园内的一座山头采集到几块绳纹瓦，内壁为乳点纹，属西汉前期遗物，可能与相传在越秀山上的

“越王台”有关。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亦认为越王台在越秀山东侧^[32]。

此外，始兴、南雄的遗址也许与南越国在粤北的布防有关。始兴罗围城堡在文献史料中不见记载，遗物年代主要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从规模及地理位置分析，当与扼守两江通道有密切的关系，军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始兴县始置于三国吴永安六年(263)，考虑到遗址中有的遗物似晚至吴晋时期，如素面瓦，因此，罗围城堡后期或许与始兴县的建置有一定的关系。南越王赵佗在粤北多处布防，在乐昌以东仁化城口筑城“以壮横浦”，横浦关即在南雄，南雄甘埠山遗址可能与横浦关有关，虽然这与历代相传横浦关在大庾岭一带所说的位置不相同^[33]，还需探讨。

除上述各处遗址外，澄海、惠阳、徐闻等处遗址可能与秦汉时期设置的县治有密切关系。澄海龟山遗址的年代延续较长，从西汉至东汉。遗址地处粤东，汉时为揭阳地，秦军越五岭南下，其中一支曾驻守揭阳。南越国时，史定曾任揭阳令^[34]。汉武帝元鼎六年(111)灭南越国，亦置揭阳县。但揭阳县治究竟在何方，一直未能确定。或以为在今揭西河婆，或说在今揭阳，也有认为在丰顺汤坑^[35]。但这三个县境内至今未发现汉代建筑遗迹。龟山遗址是目前潮汕平原最具规模的汉代建筑遗址，建筑构件如瓦当、绳纹瓦、铺地砖等，说明应是级别较高的官府建筑。这对探寻汉代揭阳县治的方位，南越国在粤东的军事布防、关城位置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惠阳潼湖蚬壳角遗址，是探寻汉代博罗县治位置的新线索。博罗县(又称博罗)建置于秦，南越国时废止，汉元鼎六年复置。但县治所在地一直含混不明。有认为在惠东县梁化，但经多次调查，未发现相关的遗迹。蚬壳角遗址位于东江南岸，是这一地区目前发现唯一的一处汉代建筑遗址，对确定汉博罗县治的方位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闻县是汉代通往东南亚、中亚各国的重要港口基地，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船只在此离港远航。汉时徐闻属合浦郡所辖，但徐闻港及县治在哪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认为在今海康，也有认为在今徐闻华丰一带^[36]。海康迄今未见相关的遗址、墓葬和遗物，华丰一带则多见东汉墓群，西汉遗物少，遗址迄今未有发现。二桥、仕尾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濒临海岸，临海不远即为三墩所在地，与《徐闻县志》关于汉徐闻城“前临海，峙三墩，中有淡水，号龙泉”的记载相合。二桥村还发现有官印，附近亦多处发现两汉时期墓葬。从出土遗物到遗址地理位置，都表明二桥、仕尾遗址最有可能是汉代的徐闻县治和徐闻港所在地，对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十分重要。

五

综观秦汉时期广东地区的建筑遗存，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1) 开始使用板瓦、筒瓦、瓦当及铺地砖等建筑构件。各处遗址，均可见板瓦与筒瓦，形制基本一致，尺寸则以宫室遗址为大，其他类遗址的略小或较小。瓦类以饰绳纹为特点，

与中原及其他省区同时期的同类器相比较，形制与纹饰都大致相同。西汉前期绳纹瓦内壁为乳点纹，西汉中后期绳纹瓦纹饰较规整，内壁出现布纹，东汉时期多将绳纹分为几组。较重要的地点出现瓦当，目前仅见于广州、五华、澄海、徐闻，以卷云箭镞纹为特色，有文字的均为篆体。铺地砖见于广州、澄海、阳春、徐闻，形制以广州所见最大，纹饰华丽；澄海、阳春、徐闻等地的铺地砖，尺寸较小，说明建筑物的级别和规模与广州有一定的差别。上述四类建筑构件的使用年代，最早始于南越国建国之时，能否早至秦代，未能确定。东汉时期还出现用长方形砖砌筑房子转角处的墙基，还有用石块垒筑墙体。

(2) 出现版筑城墙的城堡。乐昌洲仔与始兴罗围城堡均用土版筑城墙墙体，用河卵石作墙基。其中乐昌洲仔城址的年代为秦至西汉前期，是广东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城堡。广州秦汉时称番禺，据记载亦建有城廓，但秦汉时的城墙遗迹尚未发现。作为秦时的南海郡所和南越国都城，建造城池当是可信的。《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南越国灭”，可为之证。中山四路汉代走道上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也说明宫室被同时焚毁。

秦末汉初，任嚣与赵佗相继在粤北筑城布防，除已发现的乐昌、英德两处外，还在仁化城口、南雄横浦、连州徨溪、阳山、清远中宿峡等处筑城设关。此外，在今福建漳浦县西南三十里的梁山之西亦设蒲葵关^[37]。相信在这些地方会发现相关的文物遗迹。至于秦汉时置县的龙川、揭阳、徐闻、博罗等地的县治，是否有筑造城堡，还未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

(3) 使用绳纹瓦、瓦当和铺地砖这些建筑构件的建筑，其建造技术是由岭北传入。开始使用斗拱式梁架，仿效中原地区的高台榭形式营造宫室，其使用者主要是上层统治者。岭南出现仿中原式建筑，既是秦统一岭南的物证，也是岭北汉文化南传的结果。广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陶屋模型，正是当时房屋建筑形式的反映。广州东汉建初元年墓出土的陶城堡模型设有角楼^[38]，这在五华狮雄山宫殿式建筑遗址可看到原型，说明这种建筑形式至迟是源自于西汉前期。

(4) 遗址的建筑形制仿自岭北地区，出土遗物则多见地方特色。各处遗址均出土带戳印方格纹陶器（片），这种戳印纹是汉代岭南土著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特征之一，很可能是受岭北封泥、印章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有一些戳印纹样，是当地先秦时期即已流行的陶器纹饰，如圆形或菱形戳印中的米字纹、方格纹、云雷纹。汉初的戳印纹以不规则形、组合形或圆形、菱形为特点；西汉中期始以方形为主，东汉则渐次衰落；东汉后期已少见。乐昌洲仔遗址的戳印纹中，有的在方格纹上加戳圆圈，有的戳印内为方格、三角形和三角与方格组合纹，显然属早期形态。在年代较早的广州中山路、五华狮雄山、乐昌洲仔遗址中，出土陶片有米字纹、水波纹、篦点纹等战国以来较流行的纹饰。遗址中土著特色的器皿在汉初仍较多见，西汉中期以后，汉式器物渐多，到东汉时期，汉式器物已较流行，这

种情况在广州汉墓和乐昌对面山冈两汉墓群都可见到。

(5) 目前已发现的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 分布在粤北的几处位于古道要冲, 与军事当有直接的关系, 反映了南越王国为防止岭北军事势力南下而驻重兵于粤北的历史事实。五华狮雄山遗址为南越国王的行宫, 阳春古旧塘遗址如与白鹿台有关系, 则也是行宫性质。这两处遗址都不是战略要地。澄海、惠阳、徐闻几处遗址主要是官署性质, 其中徐闻二桥、仕尾可能是港口遗址, 与海外贸易的关系更为密切。总的来说, 广东地区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 与这一时期郡县的设置, 南越国的建立与灭亡有直接的关系, 反映了秦统一给岭南带来的巨大变化, 其本身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的象征。这些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 自秦汉以来, 岭南土著民族与汉民族逐步融为一体, 共同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文承黄凤好绘制线图, 谨此致谢。

注 释:

- [1] 麦兆汉神父:《粤东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学会 1975 年版。
- [2] 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考古》1963 年第 4 期。
- [3] 梁明桑:《广东连江口发现汉代遗址》,《考古》1964 年第 8 期。
- [4] 广州市文管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 年第 4 期。
- [5] 邱立诚等:《广东五华县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 年第 11 期。
- [6] 邱立诚:《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初识》,《潮汕风采文丛·卷五·潮人探奥》,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89 年版。
- [7] 邱立诚等:《徐闻县汉唐遗址调查记》,《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 期。
- [8] 邱立诚等:《始兴县罗围犁头嘴汉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 [9] 罗耀辉:《南雄首次发现汉代遗址》,《南方日报》1984 年 11 月 30 日。
- [10] 刘建安等:《乐昌县河南村洲仔汉代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 [11] 崔勇等:《惠阳县渔湖区考古调查简记》,《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 期。
- [12] 刘大强:《阳春汉代遗址及明清墓葬发掘简报》,《广东文博》1990 年第 1 期。
- [13]《广州市中山五路汉代建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 [14] 赵君谋:《光孝寺发现珍贵文物》,《羊城晚报》1990 年 5 月 16 日。
- [15] 戴开元:《“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说质疑》,《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昊壮达:《“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问题》,《广州研究》1983 年第 2 期。
- [16] 吴凯:《徐闻出土汉官私印》,《中国文物报》1994 年 3 月 13 日。
- [17]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 [18] 福建省博物馆等:《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 年第 3 期。
- [19] 杨鸿勋:《秦咸阳官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 [20] 杨鸿勋:《从遗址看西汉长安明堂(辟雍)形制》,《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 [21] 参阅曾昭璇:《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城市结构》, 1993 年中国古都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22]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 [2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 [24] 广东省文管会等:《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 年第 3 期。
- [25] 杨式挺等:《广东封开利羊墩战国西汉墓的发掘与主要收获》,《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 年版。

- [26]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揭阳县战国墓》，《考古》1992年第3期。
- [27] 龙庆忠：《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羊城今古》1990年第6期。
- [28] 邱立诚等：《乐昌县对面山东周至唐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29] 杨豪：《广东韶关西河汉墓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1981年版。
- [30] 粤博：《广州光孝寺》，《文物》1982年第4期；又参考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 [31] 李根：《广州人民公园出土文物目击记》，《羊城今古》1990年第1期。
- [32] 参阅曾昭璇：《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城市结构》，1993年中国古都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33] 《古南越国史》，第27页。
- [34] 《潮州志》。又见吕烈丹：《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
- [35] 黄朝凡：《汉代潮汕建制的探索》，《潮汕风采文丛·卷五·潮人探奥》，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
- [3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考古》1977年第4期。
- [37] 《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五。
- [38]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邱立诚，华南师范大学毕业，从事文博工作四十余年，现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文本选自《粤地考古求索——邱立诚论文选集》，原载《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